热烈祝贺云南省总工会成立70周年

“你是风景，你是传奇”：追寻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前世今生

一

“第19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我们蒙自市共有职工37069人参加，比上期净增1290人，共汇集互助金444.77万元，新增参互单位20个，”2023年4月4日，蒙自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李芳很高兴地介绍该市第19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情况，“从这项活动开展以来，活动作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补充，是工会让职工在国家医保之外再缚一条‘安全绳’，成为职工抵御风险的‘第二道防线’，因此，活动深得人心。”

4月3日上午，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主任张小彦以翔实的数据，讲述了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此前全部18期的情况，“从2004年7月开始的第1期，到2022年的第18期，参加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职工总共达5140.89万人次，总计汇集互助金46.16亿元，总共支出了42.39亿元，共帮助了患病职工616.2万人次。”

他补充说，“今年的第19期组织参互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参互职工达362万人，汇集互助金4.3亿元，如果加上达两组数字，迄今的全部19期活动，先后总共参互职工达5500万人次，汇集互助金大数为50亿元。”

参加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职工，从2004年7月第1期的180万人，到2023年第19期的362万人，这个数字翻番的背后，折射了过去19年全省职工对活动的认可，也反映了这项由工会承头组织的活动本身的公信力、美誉度、影响力在与日俱增。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举办19期，汇集互助金进出接近100亿元，所有资金以及所产生的利息百分之一百，全部花在参互职工身上，经受住了来自内外的审计监督和各类监督检查，所有的审查都表明：所有费用没有一分钱被滥用！

这项活动一开始，在当时还不可能有大数据技术的情况下，主理医互中心的负责人，如曾经担任中心副主任和主任、现任省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的张松，就认定，仅靠个人的道德自律不能保障这笔善款不出事儿，得建立权力的切分制衡制度，张松后来在中心实行了最大限度的分权制衡，“包括我，中心当时全部6个工作人员，我们把中心的权力全部切分，几乎每个人都管事，有管图章的、管账的、管保险柜钥匙的、管审批的，相互制衡，要动一分互助金几乎要全部人参与，否则根本动不了，没有一人独大的权力。”

3月28日，随着云南工会的“数字工会”成功上线，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又多了一道防范廉政风险的“技术篱笆”，省总分管职工医疗互助工作的副主席尚建明认为，职工医疗互助管理大数据系统的建成，“从技术上彻底避免了可能的廉政风险，因为所有工作人员已经无法接触现金，全部手续由当事职工在手机上就办理了，补助金直接从医互中心账户打到职工个人银行卡上，方便了职工，强化了风险防范措施。”

“就是说，”他强调，“活动事实上成为云南工会一面一尘不染的廉政公明镜子。”

值得一提的还有，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补助金额，一升再升，按照第19期的活动“游戏规则”，若有患重大病的职工符合活动规则，可以分两次获得各50万元的补助，最高总计可以达到100万元，张小彦说，“在当前国家医保报销政策之下，加上参加工会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补助，基本上解决了职工不敢看病、看不起病的后顾之忧。”

这里有一个鲜活的例子：

2021年3月，临沧市xx县供电局职工何

云南省总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在权接受采访，讲述他和党组其他成员创意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故事。

xx急性重症胰腺炎复发，且引发多器官衰竭，入院治疗50多天，最终抢救无效身故，治疗花费共计81.94万余元，医保报销后，他家人仍需承担58.38万元费用。

好在何师傅一直参加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所属基层工会及时帮助何师傅申请了医疗互助活动补助，同年9月16日，尚建明带着活动中心副主任龙池燕等干部来到何师傅家中，看到何家环堵萧然，内心相当凄恻，“他家的住房加上家中的物品，全部家当价值不到20万元，很可怜。”

于是，尚建明代表省总和全省广大参互职工给何师傅家人送去补助金465760元。

“原来，2021年，省总为贯彻落实关心关爱一线职工的工作原则，将活动最高补助封顶线由20万元上调到了50万元，”龙曲燕说，“这笔钱，按照第17期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规则，是最高补助，使个人自付比例从71%下降到了14%，最后何师傅家人只需承担118160元。”

但余下需要自付的这118160元，何家也难以承受。

尚建明等省总来人经过实地调查后发现，“老何夫人一年务农的收入就2000元左右，他女儿和儿子收入微薄，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没有余钱偿付这笔近12万元的款子。”

它心仁厚的尚建明又积极协调当天有关陪同单位的领导，希望他们“众人拾柴”，最后这笔118160元的费用也被纷纷“认领”走了。

何师傅家人脸上写满笑意。

以“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两句深刻而通俗的宣传话语影响全省职工的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自它呱呱坠地，就是奉着帮助少数不幸罹患大病、重病职工去的，因此，这项活动一诞生，表现就十分非凡。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起始于2004年7月1日，当年8月，就产生了按第1期活动规则应该给予报销的最高一笔补助费用，曾经担任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和主任、现任省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的张松说，“当时迪庆州xx县教育局藏族职工此x器官移植产生医疗费用345944.82元，医保报销之后，他个人需要承担212824.82元，就在此时，因为他参加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他获得了当时第1期该项活动的最高补助128020元，为他解决了大问题。”

此x当时月薪只有1900多元，住房已在8年前为妻子治病变卖，妻子去世后，他一人抚养着两个孩子……

“了解这个背景，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为他报销128020元的意义和价值就无须赘述了。”张松说。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诞生是云南省总工会依照“党政所谋、职工所需、工会所能”的工作准则主动作为的结果，从孕育到诞生，从诞生到发挥巨大作用以至今天成为云南数百万职工不可或缺的服务产品，19年来，它一路走来，成效斐然，得到了来自省委、省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的高度赞许和肯定。

二

如前所述，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是云南省总工会自加压力、主动担责、帮助职工消除“痛点”的杰作，但正如所有工作一样，它也有自己最原始的肇因。

这个起因既偶然，又必然。

4月3日，为庆祝省总工会成立70周年，省总召开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座谈会，省总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在权以“工会的一切工作都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主题，作了一个即兴发言，张在权的发言实际上是他从1997年6月调到省总担任领导10年的简略总结，其中，他告及了有口皆碑的“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就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角度说，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这项金牌工作最早萌生于张在权自己的一个健康小问题上。

2002年12月26日至28日，云南省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选举出了云南省总工会第九届领导班子，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江巴吉才当选为省总主席，张在权当选为常务副主席。

16岁就到云南冶炼厂当工人的张在权受组织培养逐步成长为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但他始终有工人的情结，一次小手术，令他萌生了一个迄今追福云南5500万人次职工的“大手笔”。

2003年7月，张在权因为微差，做了一个小手术，医保给他报销之后，自己还承担了两三千元。

这次治疗报账对他触动很大，推己及人，张在权想到了广大职工，“我还是正厅级干部，做个小手术自付都这么多，一般的职工，尤其是困难职工，即使有医疗保险，他们得个大病自付部分会有多高啊？”

但作为云南省总工会工作创新的一个步骤，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诞生又具有相当的必然性。

当时，时值各级工会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下岗失业困难职工的帮扶上，而困难职工因病致困或因病返困者不乏其人，同时受上世纪50年代云南各级工会曾经建立的“互助储金会”制度的启发，张在权于是有了想法。

他最初的想法是，工会能否对解决患病职工治疗费用自付部分高昂的问题有所帮助，“这也是我们工会当时创新帮扶困难职工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

张在权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时任省人大常会副主任、省总主席的江巴吉才做了汇报，江巴吉才听完后颔首不已，他指示道，“好事要办好，实事要办实，不能拍脑袋决策，需要科学的论证，需要经济学者的认真精确地测算和反复论证，还需要劳动、人事、财政、卫生、审计等相关的多个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对他们的调研，需要对全省医保情况做普遍而详细的调研，拿出第一手资料来。”

此后，筹备工作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个是派出好几个工作组，分别到已有类似工作的省市考察学习取经，到省内普遍调研，另一个是，按照江巴吉才关于要有“科学论证”的要求，张在权亲自来到云南财经大学，邀请精算专家李兴绪教授担纲活动的方案设计。

时任省总巡视员的施之兰和时任省总副主席的童凤华冒着酷暑带队外出上海、浙江考察，时任省总法律保障部部长的王惠萍到辽宁、宁波、四川考察。

在省内，省总组织8个工作组分赴16州市和产业厅局（公司）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省总党组当时给即将诞生的“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定下两条铁打的规矩——

从思想行为，到制度保障上，要绝对保证不允许有一分钱的盈利，所汇集的全部资金及因此孳生的利息不将进行任何投资经营。

工作人员的全部工作经费由各级工会从工会经费里另外列拨，职工交纳的互助金包括孳生的利息，每一分每一厘要全部用于职工身上。

云南财大的精算专家李兴绪教授把这两条规矩叫作“天大的原则”。

这两条铁规事后证明，这是“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生命力所以旺盛不衰的最重要的推动。

此外，考虑到实施的可操作性，党组用4个高度凝练又准确到位的词组给活动定下了运作的调子：“干法周圆，于事简便，方便职工，管理科学。”

“省委高度支持这项工作，省政府也十分赞赏，省委、政府两办、省卫生厅、财政厅、审计厅、社保厅，编办等有关单位都表示要积极支持，一路绿灯，”尚建明回忆道，“当时，省总提出，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风险准备金，省政府就协调云南中烟提供了100万元风险准备金，另外省财政又给了100万元的开办费。”

在尚建明看来，这1100万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省委、省政府对工会的信任，对这项工作的巨大支持和期许。

曾经分管职工医疗互助工作的省总时任副主席杨文学说，“当时的省委常委中，除了部队常委外，全部亲自参加医疗互助活动，省政府所有副省长也参加，这表明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我们工会这项活动的高度支持。”

此后，是全省性的宣传动员发动工作。

全省各级工会的1300多名工会干部走上街头、走进厂矿，向广大职工宣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等宣传话语深入人心，广大职工踊跃参加医疗互助活动，高建明回忆说，“截至当年6月30日，全省参加第一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单位有17887个，参加人数达1806105人，收到职工交纳的互助金总计为130039560元。”

“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汇集到的互助金，都超出了省总预定的目标。”时任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现任省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张松说。

2004年7月1日上午，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当天昆明骄阳当空，万里无云，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正式启动。

第1期活动共有70980人次得到补助，其中获得1万元以上的412人，10万元以上的3人，1个人获得当期补助最高额的128020元，这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迪庆州xx县教育局藏族职工此x。

“参加职工人数从第1期的1806105人到第19期的362万多人，绝对数至少上升了180万人，就是全省职工对这项工作的最大肯定，”尚建明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辉煌过往时表示，“这个活动靠大数取胜，如果职工普遍参加，就能健康持续发展下去，否则，就会天折，活动的公信力、美誉度和影响力又是决定职工参与活动的热情度高低的重要原因。”

“职工参加活动的热情之高，令人惊讶，”省总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介绍，“个别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活动，结果引发职工上访，形成群体性事件，你说多有意思。”

后来接任江巴吉才的原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省总主席张百如提出：“要确保100%的互助金用于生病住院的职工，确保100%的工作经费由工会经费承担。”

时任省总副主席的杨文学则把张百如关于两个“100%”的指示具体演绎为“五不让”理念——

“不让一分互助资金不安全、不让一位服务对象受委屈、不让一件补助申请被耽搁、不让一笔违规补助成现实、不让一个正直行为受到打击。”

三

19年来，直接或参与从事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工会干部难以计数，迄今为止，仅仅是在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担任过领导的省总干部就多达11人。

4月6日，现任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主任张小彦提供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显示，迄今先后担任过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主任的省总干部有5人，他们是：童凤华、张松、罗秋华、杨永生、张小彦。

先后担任中心副主任的省总干部有6人，他们是：吴以平、余波、余庆湘、甘涌、陈兆龙、龙曲燕。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云南省总副主席尚建明（右四）、楚雄州总工会主席商顺鸿（右五）和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主任张小彦（右一）等为参互职工送补助金。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工作人员到曲靖市调研职工医疗互助工作。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主任张小彦（左二）在楚雄市调研职工医疗互助工作。

“就是说，”尚建明说，“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只要他们参加了云南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且加入工会组织，是我们的会员，通过所在工会集体报名，就可以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享受和在职职工、退休职工一样的权利，活动实现了对所有职工的一视同仁。”

还有一个重大改良是，最高补助标准由第18期的465760元提高到50万元，不仅如此，对在多重保障后仍然负担较重的少数职工，个人负担费用剩余超过10万元（含）以上的，按照剩余个人负担费用的20%~40%给予“二次补助”保障，“‘二次补助’最高50万元封顶。”

“经‘二次补助’后，”尚建明言简意赅，“意味着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最高补助金额将达到100万元。”

“19年来，活动方案先后经历过8次旨在使活动更优化、使参加职工更有获得感的调整，”尚建明说，“如前所述，参加这项活动的职工人数不断增加，获得补助的职工范围不断扩大，互助金运行十分安全稳定，活动的公信力、美誉度，影响力与日俱增，对患病职工的最高补助金额一直在上调，从今年起，最高补助可以达到100万元，这个变化足以洞见云南省总为广大职工服务的拳拳之心。”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由我来总结，可能角度更好，请江巴吉才、张百如、王树芬几位主席来说，他们可能因为谦虚而不好意思。”现任云南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宏是2022年11月28日从省委转岗省总工会的，“我到工会工作迄今4个多月，在工会战线，还是新兵，但因为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已经圆满完成了18期，我以前在别的单位工作时也了解过，我个人也参加过，不敢说很在行，但一点都不陌生，到省总工作这4个月，躬逢省总成立70周年盛典，我对我们工会这项活动做过深入的研究，我有几点感悟。”

“其他的方面，建明副主席和小彦主任已经介绍了不少，不再重复了，我的感悟有三点，”王宏目光灼灼，用情殷殷，“第一，这是我们工会主动担责，主动服务职工，主动创新工作模式，替党和政府分忧的崇高举措。我了解过，在20年前，这项工作不是党委、政府和上级工会的硬性而明确的要求，而是我们云南省总主动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自选动作’，说白了，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创性、创新性工作范例。”

“其次，”他说，“这项工作表面是以工会的影响力吸引广大职工广泛参与的一项经济活动，但实际上是政治性很强的一项工作，20年前，在工会面临协助党和政府积极帮扶下岗失业职工的大背景下，以一己之力主动牵头，最大限度阻止部分职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举措是工会作为党的群团组织发挥政治性作用的有益尝试。”

“第三，我们省总这项活动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一直坚持把退休老职工纳入服务的范畴，这体现了云南省总高度的政治站位并实践我们党的政治伦理，道理很简单，现在的离退休老职工，就是我们国家成立后几十年建设时期的中坚力量，他们年轻的时候，为国家的建设，为巩固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付出了青春、热血、智慧和汗水，有的甚至牺牲了健康，他们现在年纪大了，身体的各种毛病多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我们用活动服务他们，还不是简单的送温暖，而是把党和政府对老职工的关爱，从工会角度延伸到他们人生的末端。”

“就是说，”王宏意犹未尽，“在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视野中，‘无病帮人’，有血重晚晴’不是诗，而是温暖的现实。”

（图/文 沈晓）

在解困脱困攻坚的关键节点，2020年，云南省总在滇西、滇南、滇中三个片区召开了座谈会，督促各部门协力解决困难4800余个。

2017年9月，祥云县时任县委书记王林在“全国工会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研讨会”上，向与会领导介绍“祥云样本”的由来及进展情况。

2018年，云南省总有关工作人员陪同全总领导慰问结对帮扶的困难职工段四农（中）。

“云南工会力量”：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破晓曙光

一

2021年7月26日，昆明。

云南省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总结表彰会召开。

回顾过去5年半云南省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峥嵘历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树芬心潮起伏，她说：

“2016年以来，在省委和全总正确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全省各级工会和广大工会干部奋力拼搏，共同努力，尽锐出战，合力攻坚，经过5年多的接续奋斗，全省7.1万户困难职工全部如期实现解困脱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贡献了云南工会力量。”

至此，“云南工会力量”这个概念因为全省各级工会在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上的卓越贡献，正式进入了云南省总以及各级工会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总结视野。

云南省总分管职工帮扶服务工作的副主席张驰认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省总深知，制度保障是核心，为此省总先后下发了解困脱困工作规划，出台了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考核评价、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的相关文件11个，确定了6个方面25个具体项目进行量化考核。2019年，又结合云南工作实际，会同省级八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相关政策的通知和10个制度文件，对困难职工精准帮扶的重要环节进行了制度规范，让不同层级困难职工的帮扶慰问有了更具体的措施办法，构建了云南独具特色的‘1+10’梯度帮扶制度体系，实现了对困难职工的‘一般困难机制帮、突发困难及时帮、突出困难重点帮’。”

据她介绍，正是得益于如此强大的制度和政策支撑，各级工会才能累计筹集9亿余元资金，对在档困难职工实施了30万余户次生活救助、2.5万余户次子女助学救助、1.3万余

2017年9月，全国总工会在云南召开“全国工会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研讨会”，云南省总培育打造的“祥云样本”获得了与会领导和代表的高度关注。

户次医疗救助和7.8万人次技能培训、就业咨询、就业指导，“并积极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精准施策，帮助在档困难职工共落实就业9700余户、社会保险6400余户、医疗保险1200余户、子女助学3400余户、住房保障3300余户、低保保障8700余户，根据第三方评估显示，全省全国级困难职工家庭生活救助金从2016年的每户800元提高到2020年底的9680元，100%的建档困难职工获得了工会的生活救助金，99.9%的困难职工家庭得到了就业、就医、就学等不同类型的帮扶措施，98.4%的困难职工认为通过工会帮扶自家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99%的困难职工对工会帮扶工作表示满意。”

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必须“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此情况下，“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管理、精准退出”等四个“精准”就成为省总“聚焦精准”的前提，时任省总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主任的李卓坤认为，云南省总仅用5年时间，使7.1万户困难职工脱困，“聚焦精准”是一个重要原因，“不精准，就丧失了识别、施策、管理和退出的科学性，不仅浪费资源，而且还会流失宝贵的时间。”

省总法律和维权工作部部长张泽平说，正是基于“精准”这个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关键步骤，2016年，省总组织全省工会对全省8.4万户在档困难职工进行逐一入户调查，全面开展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最终确定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7.1万户。

据张泽平介绍，2018年，深入开展困难职工精准识别“回头看”行动，与相关部门建立信息核查比对机制，对7.1万户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再次全覆盖逐一复查清查，累计核查住房、车辆等信息23.2万人次，全面精准掌握了困难职工的情况。

他说，“2019年，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率先在全国组织困难职工动态管理第三方核查评估，进一步突出以问题为导向，掌握了实情，推动了问题整改。”

“2020年，我们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省总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主任莫涵雅说，“我们开展了‘户户清’专项攻坚行动，查找出困难需求5000余个，在解困脱困攻坚的关键节点，我们在滇西、滇南、滇中三个片区召开了座谈会，督促各部门协力解决困难4800余个。”

近年来，各级工会以“聚焦精准”为目标，科学制定帮扶措施，做到“一户一档案、一户一计划、一户一措施”，做到因人施策、因户施策、精准施策，莫涵雅介绍了以下11组数据，“截至2020年底，帮助6.9万户困难职工实现脱困，2000余户重病、残疾困难职工家庭纳入政府兜底保障和工会常态化帮扶实现解困。通过第三方评估显示，我省错评率仅为0.05%，结对帮扶覆盖率达99.9%，帮扶方式精准率达99.8%，综合精准帮扶率达99.6%，均达到全总规定的参考值。”

另外还有5组数据是，“建档困难职工中，97.3%的就业有保障，99.1%的就医有保障，99.9%的就学有保障，94.5%的养老有保障，100%的困难职工住房有保障，全省建档困难职工基本实现了‘两有五保障’，全面完成了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目标任务。”

二

在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中，云南省总视创新驱动为关键环节。

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之前没有可供拷贝复制的现成例子，张驰说，“我们鼓励各级工会结合实际、大胆创新，因地制宜开展解困脱困工作。大理州祥云县时任县委书记王正林、时任县长黑尚锋亲自负责，统筹推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和脱贫攻坚工作，充分整合资源，运用系统集成方法，将全县各部门社会救助、脱贫攻坚政策措施与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有效对接，形成了‘祥云样本’，红河州党政领导亲力亲为，发动对困难职工进行‘部门一帮多、领导一对一’的结对帮扶，全州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和361个部门与困难职工进行了结对，形成了‘红河经验’。”

“就是说，”莫涵雅就“祥云样本”和“红河经验”进一步解释说，“云南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过程中，以省总为代表的‘云南工会力量’贡献了享誉全国的‘祥云样本’和‘红河经验’，这两个范例，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牵头、系统集成’为准则，以‘守土有责’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搬动各类资源，服务于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为全省7.1万户困难职工最终全部如期实现解困脱困贡献了工会力量。”

“省总率先在全国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第三方核查评估，制定困难职工长效梯度帮扶机制的做法，在全国会议上做了经验交流，”省总法律和维权工作部部长张泽平说，“这些不断前进的经验做法，为推动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提供了先行示范，在全国范围内创立了独树一帜的解困脱困云南经验，得到了全总领导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

在张泽平的记忆中，云南省总推进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经验做法，被省委、省政府和全国总工会领导6次作出批示加以肯定，省总领导两度受邀在全国总工会会议上做经验交流。

“2021年5月31日，云南省总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获奖的省级单位，在全国总结表彰会上就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经验做了交流。”他说。

2016年，祥云县按照省总工会、大理州总工会“抓试点、立标准、建机制”的要求，率先在全省启动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把这项工作纳入全县脱贫攻坚重要组成部分统筹部署，成立了时任县委书记王正林、县长黑尚锋任组长，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10个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23个乡镇、系统、行业工会主席为成员的“困难职工解困脱困领导组”，下设10个工作组（室），全面负责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

祥云县时任县委书记、现任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正林说，“工作按照‘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困’原则，将城镇困难职工按‘低保户、低保边缘户、意外致困户’情况区分，”截至2016年8月底，全县上述三类在档的国家级困难职工共有293户，涉及供养人口1080人，其中低保户98户，低保边缘户77户，意外致困户118户。”

“经逐一入户调查了解，这些困难职工致困的主要原因是患病、低收入和下岗失业，再进一步对这293户困难职工进行分析，确定需要就医帮扶的有137人，需要就学帮扶的有43人，需要就业帮扶的有13人，需要住房帮扶的有20人，需要社保帮扶的有80人。”王正林回忆7年前的数字，依旧记忆犹新。

王正林介绍说，2016年9月19日，祥云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意见》，文件根据全县在档困难职工群体实际致困原因，提绘“帮扶谁、谁来帮、帮什么、怎么帮、如何退”等核心问题，立足“一户一档案、一户一计划、一户一措施”，调集党委、政府强大的政策资源，出台了差异化帮扶的具体办法，实施好“就医、就业、就学、住房、社保”五类帮扶。

时任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总工会主席程云川介绍了根据“系统集成”的思路，祥云县有关部门的分工，“县人社局、卫计委负责就医帮扶；县民政局、妇联、团县委、关工委、残联、红十字会、企业家协会、慈善会负责就学帮扶；县人社局、扶贫办、金融办、工商联、团县委、妇联负责就业帮扶；县住建局负责住房帮扶；县人社局、工信局、商务局、供销社、工商联、工业园区负责社保帮扶。”

“整个工作的推进，监督和督办的负责机构为县纪委，”王正林回忆说，“各单位推进过程中，若有问题，我们县纪委随时跟进问责。”

程云川说，祥云县的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从一开始的相别，到后来的实现层面，有多达27个部门和全县10个乡镇参加，这些部门和乡镇，囊括了全县体制内所能调动的全部资源，同时将职责明确具体到各部门、各乡镇、各单位，因此，效果迅速呈现且十分彰明。

程云川介绍道，比如在祥云县，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健全完善了“源头解困、动态脱困、应急救助、常态帮扶”的工作机制，形成了“政策支持、项目支撑、结对帮扶、社会保障”的工作合力，“截至2020年9月，全县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覆盖了困难职工300户1099人，解困脱困293户1086人，在档5户13人。”

王正林还记得，经过省总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第三方质效评估，“祥云县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在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一。”

“从政策资源综合运用的角度说，常识告诉我们，1+1>2。云南省总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彭增梅在打造‘祥云样本’的过程中，多次实地调研指导，她认为，“祥云样本”一个闪光点是，动员策动党、政、社会多达27个部门和10个乡镇的合力攻坚。但是它所形成的势能不是27个部门和10个乡镇的简单叠加，它的能量相当巨大，因为在这些部门、乡镇中，各自有自己的政策、财力、人力、经验、技术、背景等等资源，这些资源的综合利用，超过了任何一家单打独斗的爆发力。”

“工会的资源既有限，又无限，”彭增梅说，“说工会资源有限是指各级工会都存在人少事多、无权没钱的状况，就此而言，工会一家无法承担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繁重任务，但工会的资源又是无限的，这是指有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支持，有来自各级政府政策资源的期力相助，以及广大职工，包括困难职工的理解支持，问题是如何去牵头，并撬动党政社会资源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所用，这就是省总和州总打造‘祥云样本’时提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牵头、系统集成’的大背景。”

彭增梅认为，由于“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牵头、系统集成”特点在全国的高度普遍性，这也就是“祥云样本”所以具有可推贝性和高复制性，进而为全国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作出自己特殊贡献的根本原因。

云南省的红河州是有色金属老工业基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困难职工群体也随之产生，迄2017年3月1日，红河州向有国家级建档立卡的城市困难职工家庭9918户，涉及困难人口24795人。

于是，一个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严峻课题摆在了以“守土有责”为责任意识的红河州总工会面前。

根据红河州实际情况，红河州总则以“一对一”结对帮扶、五级帮扶网络发力和大数据精准识别三记“铁拳”，打造出老工业基地在新时代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上的“红河经验”。

一是巩固和升华“一对一”结亲帮扶的优良传统。

面对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日益增多的现实，自1998年由州总工会提出并征得州委、州政府、州人大、州政协四套班子领导同意，红河州就正式而广泛地开启了领导干部和困难职工“一对一”结对帮扶的历史，根据帮扶方案，一位县级领导干部认一户穷亲戚，被帮扶的困难职工不脱困，该领导的帮扶不脱钩。

这项工作启动以后的20年间，四任州委书记带头结亲帮扶，三任州总主席坚持不懈抓落实，推动落地见效。

再是建立困难职工帮扶的“五级网络”。

2003年，红河州总在总结开远市等县市工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发文建设帮扶困难职工的“五级网络”。

五级网络由州级困难职工援助中心、县市分中心、乡镇援助站、社区分站、企业（单位）援助点构成，其特色在于双向互动，一方面从州上开始逐级联动，直至最末端的援助点，直接作用于困难职工身上，另一方面，从援助点开始，逐级将困难职工的“痛点”反馈到州上。

三是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困难职工。

红河州总除了充分发挥五级网络作用及进行传统的入户调查以外，还利用政府管理部门的大数据，积极创新识别方式，这些政府部门所提供的信息、数据翔实，事实充分，对精准识别困难职工发挥了很大作用。

自2016年以来，红河州投入资金7814万元对11.5万户（次）困难职工家庭实施生活、助学、医疗救助，通过大规模投入，特惠性政策支持，红河州9479户困难职工成功实现解困脱困，在2021年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表彰会上，红河州总荣获“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状”。

三

“困难职工的各项困难问题，经过各方艰苦努力，已经基本解决，但是，”省总副主席张驰以理性、客观的分析审视这项工作，“困难职工增加或减少是一个动态现象，就是说，不可能一蹴而就，幻想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现实的，因此，云南省总出台1+10组合拳制度，建立完善困难职工兜底保障和预防返困长效机制，以此作为对新产生的困难职工适时预警、救助于预、中止返困的长效机制，实施近两年来，客观效果达到了预设的目的。”

张驰所说的“1+10”制度文件集群，是指云南省总于2019年至2020年发布的《云南省总工会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落实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相关政策的通知》以及配套的10个实施细则文件，其中包括《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建立健全困难职工帮扶长效机制的意见》《云南省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困难职工精准识别结对帮扶办法》《云南省困难职工脱困退出办法》《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对因患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实施帮扶的办法（试行）》《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对因遭遇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实施帮扶的办法（试行）》《云南省工会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工会女职协学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工会困难职工技能培训促就业管理办法（试行）》。

省总法律和维权工作部部长张泽平介绍说，“1+10”制度文件发布后，云南各地工会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实招频现，效果良好，2021年，为进一步巩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与提升职工生活品质有效衔接，省总对“1+10”制度进行了系统性修订。

他说，云南各级工会深入贯彻落实困难职工“1+10”帮扶服务制度，根据困难职工不同困难类别，在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分类帮扶，不断深化层次清晰、各有侧重、有机衔接的梯度帮扶工作格局。

“2022年，全省工会共投入5886.5万元（省总安排5406.03万元），帮扶困难职工10686户次，做到了‘一般困难机制帮、突发困难及时帮、突出困难重点帮’，”省总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主任莫涵雅说，“我们针对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在最大力度实施生活救助的基础上，分类开展助学救助和医疗救助，组织实施生活救助项目两个，基本生活救助项目投入3102万元，帮扶5918户次；针对25个边境县市的在档困难职工开展物价补助项目，共对291户困难职工，发放58万元物价补助帮扶资金；对620名在档困难职工开展医疗救助，个人最高帮扶金额达到4.9万元，使用帮扶资金467万元；对1081名在档困难职工子女开展助学救助，使用帮扶资金658万元。”

“针对意外致困职工，”她介绍说，“按照突发困难及时帮的原则，根据《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对因患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实施帮扶的办法》《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对因遭遇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实施帮扶的办法》，由各州、市总工会和产业系统公司工会对于符合条件的意外致困职工及时给予帮扶，全省共计帮扶124名困难职工，其中，最高补助金额达4.9万元，共计发放帮扶资金251.72万元（省总安排了176.2万元）。”

她说，“而针对一般困难职工，根据《云南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管理办法》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全省共计补助2636名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1348.07万元（省总安排了943.64万元）。”

“另外，”省总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晓黎补充说，“2022年，省总工会为持续巩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推进困难职工家庭常态化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开设了‘云南省职工困难帮扶申请’微信小程序，畅通职工困难申请渠道。还率先在全国开展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动态监测集中行动，对9582户次已脱困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进行调查了解，走访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1039个，走访受疫情影响困难企业中困难职工8336户。”

“对发现符合帮扶条件的及时建档帮扶，做到快速发现、及时响应、应纳尽纳、精准帮扶。”刘晓黎说。

省总以送温暖30周年为契机，结合云南实际，推进送温暖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刘晓黎说，“2022年，全省各级工会共计筹集送温暖资金1.83亿元（其中，省总工会投入1亿元），聚焦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突出对重点群体的关心关爱，全年共计慰问职工65.54万人次。其中，慰问环卫工、特岗、停发工资或只领取基本生活费的困难职工8.7万余人次，涉及资金5278万元。”

张驰介绍说，2023年，省总组织全省各级工会开展以“宣传贯彻二十大工会温暖进万家”为主题的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发动全省各级工会多渠道筹集资金，不仅加大对困难职工帮扶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强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困难职工的关心关爱，“全省各级工会筹集1.45亿元资金（其中省总工会本级筹集8138余万元资金），共计慰问31万余人次，包括已建档的困难职工2503户、受疫情影响的困难企业职工6万余人。”

“有了严密的制度保障，加上各级工会的责任担当意识，通过制度形成的工作常态化，再加上各级工会工作能力不断提升和工作实力的不断增强，”张驰说，“我们不敢保证不产生新的少量的困难职工，但我们可以做到随时随地为他们解决困难，将其困难消弭于无形，不会形成困难职工成‘气候’的‘势态’。”

（图/文 沈晓）